

# 日本在战后亚洲

〔美〕劳伦斯·奥尔森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日本在战后亚洲

[美]劳伦斯·奥尔森 著

伍 成 山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Lawrence Olson*

**JAPAN IN POSTWAR ASIA**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70

根据纽约普雷格出版公司 1970 年版译出

**日本在战后亚洲**

〔美〕劳伦斯·奥尔森 著

伍 成 山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96,000

1974 年 6 月第 1 版 197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3171·102 定价：0.66 元

**内 部 发 行**

## 译 者 的 话

作者劳伦斯·奥尔森是美国韦斯利安大学历史教授，曾在日本寓居多年，就地搜集资料，研究日本问题，在报刊上写过一些有关日本的文章。后来随美国大学教师实地考察团访问过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归国后写成此书，由美国外交学会出版。作者还有《日本面面观》(1963年出版)等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植下，经济力量有了急剧的发展，并已在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加紧进行经济扩张和政治渗透。在这样的具体条件下，作者认为美国唯一可行的亚洲政策，只有利用日美同盟关系，使日本充当美国在亚洲的得力帮手，才能维护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为了这一目的，作者批评了美国过去一味向日本发号施令的对日政策，以及美国和日本各行其是的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政策”，建议日美之间结成一种比较平等的新型伙伴关系，以鼓励日本为美国效劳的积极性。

作者搜集了大量日本方面的资料和统计数字，并与各方面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因此也提供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反映了美日两国对亚洲问题的各种各样的看法，不无参考价值。但是，由于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本书的论述既不可能正确反映当前亚洲的现实，也不可能提出

有利于亚洲各国人民的意见。不仅如此，书中的错误甚至反动的观点是很多的。例如，作者经常宣扬西方所谓先进的物质技术成就和美国人的优越，并为日本帝国主义过去在亚洲的罪恶侵略涂脂抹粉，竭力辩护。与此同时，作者对我国的内外政策肆意进行歪曲和污蔑，胡说我国干预日本内政。作者还兜售“一中一台”的破烂货，鼓吹日本向“准区域”的方向前进，甚至预料台湾和南朝鲜“即使不变成另一个日本帝国的一部分，也将发展成为日本势力范围的内圈”。这种谬论代表日本一部分反动势力的愿望，值得我们警惕。诸如此类的反动观点，字里行间常有流露，甚至多次鼓吹孔孟之道，希望读者以批判的眼光阅读本书。

1974年5月

#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	1
<b>第一篇 日本回到亚洲, 1952—1964 年</b>	
第二章 最初的步骤: 与东南亚和印度的关系 .....	11
一、战争赔偿的谈判和贸易, 1952—1958 年 .....	13
二、经济外交的新行动, 1957—1961 年 .....	28
三、私营企业的活动 .....	38
四、开始支付赔偿 .....	44
五、走向经济合作的新行动 .....	56
六、提要 .....	62
第三章 漫长的等待: 同中国和朝鲜的关系 .....	71
一、日本对中国的立场 .....	71
二、文化外交和贸易 .....	73
三、同台湾的关系 .....	79
四、继续努力促进贸易 .....	82
五、日本对中国的态度 .....	92
六、日本与朝鲜的关系 .....	98
<b>第二篇 日本和亚洲, 1964—1969 年</b>	
第四章 论战方面: 从东京看亚洲 .....	115

一、中国与日本的安全：“东西方问题”.....	116
二、“南北方问题”.....	134
 第五章 行动方面：日本在非共产党统治的亚洲的活动 .....	157
一、南朝鲜.....	158
二、台湾.....	165
三、菲律宾.....	171
四、印度尼西亚.....	182
五、新加坡.....	193
六、马来西亚.....	199
七、泰国.....	206
八、日本与湄公河计划.....	214
九、印度.....	219
 第六章 结论：未来的展望.....	230
附 表 流入不发达国家及多边金融机构的日本财政资源	
统计表.....	258
主要译名对照表.....	259

# 第一章 导 言

我对本书主题发生兴趣，是从 1952 年夏天我搭乘一艘自马尼拉开往旧金山的挪威货船时开始的。当我们驶进神户港（那时的神户港已重建一新，工厂和造船厂大多由于朝鲜战争定货而生意兴隆）时，一个凭栏站在我旁边的菲律宾学生转过身来，悻悻地说：“本来这一切都应该是我们的。”这句话使我想起了亚洲各国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军事占领而向日本提出的种种要求，当时正在政府一级开始谈判。我刚好在菲律宾的美国新闻处呆过一年，对当时菲律宾人恨日本人的心情略有所知。

1955 年我前往日本为美国大学教师实地考察团工作时，我读过日本知识分子所写的一些文章，他们觉得，本国政府企图痛赎前愆而同南亚和东南亚恢复正常关系，这就不能不加以谴责。这些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人相反的却要求立即承认共产党中国。我听说他们对于亚洲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生活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很少了解；他们在制造关于其他亚洲人的各种理论或重复陈旧的意见时，总是看不起其他的亚洲人。我知道，日本知识分子同多数其他日本人一样，了解西方要比了解亚洲更清楚；由于文化上有差距，已使日本人与亚洲人彼此隔离开来，这种文化上的差距虽因国家而异，却是由于语言和价值观念的不同、物质发展速度的不平衡、政治制度的互异和过去的历史记录等所造成的。我在日本愈久，亚洲不是一个“单一体”

这个现实给我的印象也愈深。而且，日本作为一个中间国家的现象也使我迷惑不解，因为日本一面对那些在物质进步的阶梯上比自己地位低的国家和民族有自我优越感，一面觉得那些在技术上更先进的国家和民族确实值得骄傲，因而又深感不安。那时候，我只不过研究了一下日本人对亚洲人的态度和亚洲人对日本人的态度，因此所写的一些文章，也只是有关菲律宾人对日本的看法，或是日本教授批评他们的同事对于亚洲各国的事情只满足于抽象的空想，而不去或不想去那里进行实地考察。

1957年和1961年，我在东南亚和印度走了很多地方，很快就发现日本知识分子所想的和所写的那些东西，就国家的关系而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相反的，由于我与商人、政府官员、新闻记者和各行各业人士的接触和交谈，我和大多数别的观察家一样，对日本人经商的精力和无孔不入的进取心以及几乎是一味追逐赢利不禁大吃一惊。寻求市场和原料，特别是寻求原料，是在国外的日本人最显著的推动力，不管是在大陆中国还是在非共产党国家都一样。要了解日本在政治上所遵循的方向，经济利害关系可能会提供有力的线索，抱着这一信念，我就埋头研究商业活动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虽然我以前对经济学或商业没有受过训练），想从这方面来更好地了解日本的作用。东京的知识分子谴责日本新殖民主义，反对他们所谓的“讨厌的日本人”\*重新回到东南亚去，这些话虽然仍留在我的脑际，但是我对日本的海外活动和政策的全面图景研究得愈深入，这些话也就愈加变得不重要了。

---

\* 仿自“讨厌的美国人”一词，原出自威廉·杰·莱德勒和尤金·伯迪克合著的小说《讨厌的美国人》一书。原义是褒词（“讨厌的美国人”是在东南亚的一个善良的美国人），但美国人和日本人都时常错误地把它当作一个贬词来使用。

通过这两年的旅行，我写了几篇有关日本在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和文化活动的文章，一篇有关日本与共产党中国的困难关系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数已收入以前出版的一本书中。到了大约 1963 年的时候，我自信可以而且应该单独写一本论述日本重新回到亚洲去的书。至少我认为，日本将来在亚洲发挥的技术方面的作用一定极大，同样，他们同其他亚洲人交往的问题也是意义深长的。因此，我就开始收集材料，写一本关于日本与亚洲在文化和经济方面关系的书，但在 1968 年以前，一直未能集中时间来从事写作。

不过，那时候已有比以前更多的迹象证明，日本政府和私人团体正在或多或少自觉地探索新的政策，以求促进亚洲的政治稳定并加强日本在亚洲的作用。这种探索甚至在五十年代初就已经时或可以察觉，但那个时期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完全是商业性质的。这种关系在后来一个时期也一直未变，所以把日本形容成为一个“经济动物”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可以开始更清楚地看到，日本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已回到世界政治舞台，这个国家不仅追逐利润而且也在追求威望是更加明显了。六十年代初池田首相的访问亚洲和随后发表的一些富有民族主义意味的声明，首先表明了这种趋势。1963 年日本的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第二年在东京举行的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特别是随着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产生的新的信心，和六十年代追求市场和原料的加倍努力，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日本的这种趋势。此外，日本对 1964 年 10 月以来中国的核爆炸和 1965 年 9 月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的反应，也表明日本民族主义感情在不断增长，日本日益意识到亚洲的稳定同它的自身休戚相关。因此，把本书内容划分为 1952 至 1964 年和 1964 至 1969 年两个时期，这并不是随便做出的。从旧金山

和约\*的签订到池田内阁的告终，日本在亚洲是以“低姿态”出现的；1964年以后，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形象就愈益明显了。

本书试图通过日本人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态度、行动和政策的综合关系，探索1952年以来他们缓慢地、有时所获不多地追求日本在整个亚洲地区真正利益所在的民族使命的发展过程，因此，本书的结构就是按照上述尝试来安排的。第二章详细地回顾了1952至1964年间日本为清偿战争和占领所造成的祸害、支付赔款、在南亚和东南亚重新建立信用和新的经济关系网而作的努力。在本章所叙述的这一时期的前阶段，日本在经济上对亚洲极为关注。那时日本商品在美国的销路很值得忧虑；而亚洲，包括共产党中国在内，则被许多人看成是一个天然的贸易伙伴。第三章叙述日本在这同一时期内想同中国大陆做生意的种种尝试，当时中国的“文化外交”好象一心要诱使日本背离同美国的基本联盟。这一章也讨论了旧金山和约后几年中的日本与南朝鲜的关系。五十年代后期，日本人进一步认识到不发达的问题极其复杂，所以同东南亚进行贸易也希望不大了。当日本商品在美国的销路出人意外地迅速扩大时，同东南亚地区做生意的指望也就不得不为之减少。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对日政策又有了反复，因此，许多日本商人和政客想同大陆加强联系的愿望也都化为泡影。

不过，到了1964年左右，对亚洲发生兴趣的第二个浪潮又在东京出现。在那里，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仍占首要地位，但是，政治问题现在也开始更为频繁地出现于政府官员以及报刊舆论界所进行的施政方针的讨论中。至于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既

\* 1951年9月4日——8日，在吉田茂和杜勒斯共同策划下，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媾和会议，参加者五十二国，签字者四十九国，主要受害者中国、越南、缅甸等均未参加，这是美日片面签订的一个“和约”。——译者

没有发生、看来也不会突然发生重大的转变。对于一个在美国的保护下繁荣起来、并自 1945 年起一直避免直接卷入亚洲战争的国家来说，它不想结束这样一种局面，那是很自然的。日本国内和亚洲各地的舆论，仍然强烈反对扩大日本人在海外的任何军事任务，虽然有些日本人和别国人认为某一天这种任务是可能会有的，或许还会很快来临。

这时，对外援助法案在东京也逐渐地获得了人们的赞同，认为这是在亚洲以外更大的世界中维持政治稳定和建立日本的威望和地位所必需的。游说国会议员去通过援外法案的人在日本并不多，但对于大多数人民来说，援外比同其他亚洲人订立军事条约要好一些。许多日本人由于害怕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后将使他们的国家卷入一场灾难性的冲突，因而大声疾呼经济发展对于防止共产主义蔓延的重要性。到 1965 年，日本的对外援助已开始随着国民收入成比例地逐渐增加；政府一面不使自己介入人民反对的政治联盟，一面更清楚地表明它想使日本在许多日本人认为是同中国较量的一场竞赛中取得领导地位，在这场竞赛中双方都向亚洲人宣传建设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的最好道路。总之，研究日本同亚洲关系所需要的资料虽然多数还是属于商业方面的，但是在商业活动后面通常总是有着政治目的；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之间已有了新的联系；而且后者已开始寓有某些意义和形式。

第四章是通过日本资料来介绍六十年代中期在东京展开并且至今仍在进行的两大争论的主要论点。一场争论是有关日本的安全及其可能受到大陆中国所发生重大事件的影响的问题；另一场争论则是有关“南北问题”，也就是要不要向亚洲的不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提供多少，以及如何确保援助计划取得成功。而且，这两场争论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已经是愈来愈彼此

密切相关了。

第五章，论述的重心已移到 1968 年夏秋期间日本在一些非共产党统治的亚洲国家的经济等活动方面。我想在这一章中叙述日本的商业活动、技术援助、为出口成套设备或其他建设工程提供的贷款和信贷、国际财团的援助、青年志愿队的活动等概况。我也想尽可能准确地揣测最近以来日本人对亚洲人的态度和亚洲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我还提到了我所看到的似乎颇有意义的一些文化活动。希望读者从以上这些方面将看到日本逐渐回到亚洲强国地位的一幅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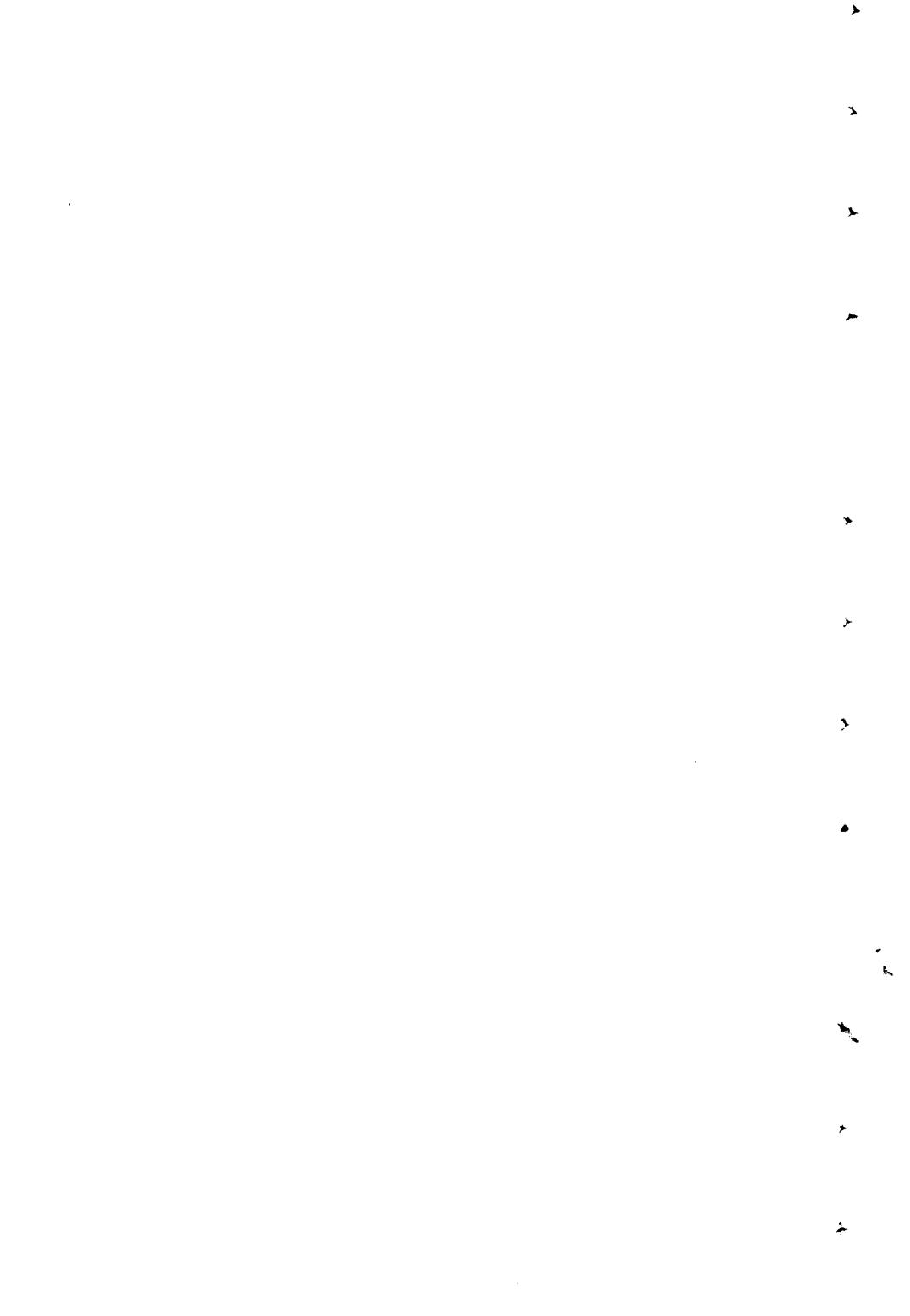
本书内容范围包括南朝鲜、大陆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缅甸只论述到 1961 年为止，以后几年因为很多有用的工作无法进行而只能从略。巴基斯坦、锡兰\* 和香港由于缺少研究的时间和机会而被略去。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有时也被提到，特别是在涉及到湄公河流域计划时，但未专辟一节来叙述它们与日本的关系。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对于其他国家，我比较详尽地写了日本在战后与南朝鲜、大陆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的关系。

最重要的文字资料都是日文的。谈话来源则包括在日本国内和在国外的日本人、其他亚洲人以及在亚洲和西方的西方人士。以上这些晤谈都是我定居外国和 1955 年至 1968 年旅行期间进行的。我必须郑重声明，我对中国缺乏任何特别的专门知识，尽管我在期刊上写过一些日本与大陆的关系的文章。本书虽然采取按年月叙事的方式，但是我也试图对每一章中的重大事件的意义随时加以阐明和评论，而在第六章中曾就日本和美国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有所论述。我的写法是尽可能地让材料自己来说明问题。但这样做通常要冒一种危险，那就是：零乱的

\* 现名斯里兰卡，以下同。——译者

事实意义晦涩，很难启发读者的深思。在这方面，我很同情读者，但他们的情况并不比日本人更糟，日本公私各方的代表们大抵都是喜欢按照他们那种独特的方式行事的，他们绝大多数只是一味想赚钱，而极少数比较有头脑的人，却想在一个前景不大的亚洲表现出一种新的日本人的模型(它的确切定义比以前更加难定)。

最后，在第六章中，我力图指出：越南战争一结束(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即将出现美国逐渐退出亚洲的迹象，那时我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日本人已准备好，并且情愿接替美国人的使命，或者以为其他亚洲人的希望就是这样。不过，我们可不能这样地利用日本人。日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日本将根据它的切身利益来行动，日本的利益自1945年以来虽同我们美国的利益总的说来是一致的，但在将来就未必如此。我的希望是，美国人将努力扩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日本人具有共同利益的那些地区，通过一切可能的双边方式，特别是多边方式，同日本人通力合作去帮助提高亚洲各地区的生活水平。亚洲的稳定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决不是我们美国人或日本人所能单独解决得了的。我们共同具有的经济才智和实用主义表明：美国人和日本人是能够共同合作来帮助别人的，这不仅符合我们的自身利益，而且也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在这方面我们已开始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对于我们未来的对中国和东南亚政策以及日本将如何同上述政策相适应，我们必须有更多的设想，如果我们想按照符合我们自己利益的方式去影响日本人的努力，并避免将来发生严重摩擦的话。美国回到孤立主义去，这只能给亚洲，也象给其他地区一样带来麻烦。



# 第一篇

日本回到亚洲，1952—1964年

